

第一章

为富起来奠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新中国在经济上还很贫穷落后。面对这种情况，要使中国富起来，一方面必须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富起来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必须把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富起来奠定社会基础。

一、为富起来奠定物质基础

建国之初，新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是极端困难的。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长期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封建主义的腐败统治、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经济极端落后，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总值的 10%，而且规模狭小，技术设备陈旧，没有重工业

基础。解放前最高年产量，钢只有 90 多万吨，原煤 6000 万吨，粮食 2774 亿斤 棉花 1698 万担。这样落后的经济，又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长期战争，到 1949 年工农业生产几乎降到了极点，钢只有十几万吨 煤 3243 万吨，粮食 2162 亿斤，棉花 889 万担。新中国刚成立时，整个国民经济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祖国的大块土地上几乎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在新解放区的城市，不少工厂停工减产，到处是严重的失业，物资奇缺，通货膨胀，投机猖狂，社会经济秩序极度混乱。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人的紧迫任务就是迅速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使亿万劳动人民的生活能有起码的温饱，并期望有所改善。没有这一点，中国又怎能谈得上富起来呢？

但是，要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收拾好贫穷落后的经济烂摊子，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又谈何容易！当时，不仅国民经济本身的严重创伤不易医治，而且战乱未平，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还有许许多多极其重要的事情要争分夺秒地去做，特别严重的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继续作乱，给我们的经济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牵制和分散了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使我们本来就很紧张的人力物力，不得不抽出很大一部分力量用于军事斗争和其它许多社会政治改革，而不能集中用到恢复国民经济方面来。

对于这一严重局面，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人的关注。帝国主义分子断言中国共产党难以对付这一局面，不可能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美国人艾奇逊曾预言说，中国共产党搞军事可以得 100 分，搞政治可以得 80 分，搞经济只能得 0 分。国内资产阶级的少数人也持同样看法。总

之，在国内外反动分子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将因为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而失败。他们虎视眈眈，等待我们的失败，伺机东山再起，卷土重来。难道中国共产党人真的要躺倒在经济这个烂摊子上而富不起来吗？

面对当时的严重形势和艰巨任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没有被国内外敌人的捣乱所屈服，他们励精图治，不畏艰险，以他们的雄才大略，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投入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伟大斗争，为中国富起来奠定物质基础。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和发展，毛泽东等人提出在指导思想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其它各项工作的关系。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况，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况是完全不能容许的。”^①他还明确指出：我们还要做其他的许多工作，但是，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报告》要求把完成一系列民主改革的任务同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结合起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紧紧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并且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在各条战线开展了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就是每一项政治运动，也没有离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而单纯搞运动。比如，在进行土地改革时，确定土地改革与生产建设两不误，在实施过程中，做到农忙搞生产，农闲搞土改。在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时，确定一面搞生产，一面搞运动。在实施过程中，“白天搞生产，晚上‘打老虎’”。即使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们党也没有放松更没有停止国内的生产建设，而是坚持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广泛地掀起了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生产高潮。当时由于坚持了以恢复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开展各项政治运动中，充分地注意用革命斗争来激发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又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生产事业上来，从而使社会改革、政治运动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正由于党正确处理了政治同经济、革命同建设的关系，所以在建国初期的3年时期内，尽管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但是基本上没有影响经济建设，相反地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从而既完成了艰巨的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第二，坚持“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对当时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指出：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同时，他还指出，全国人民基本上是拥护我们的，但是革命胜利引起的社会经济改组，稳定物价中给投机资本家以沉重打击，使资产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对我们很不满。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失业知识分子和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们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没有出路，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既打击和消灭反动阶级的残余势力，又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组织千军万马的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生产建设中，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战略方针。他说：“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

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①

在“不要四面出击”的正确思想指引下，当时党对各项政治运动都很讲究策略和政策，十分重视区别对待，尽力分化敌人，减少阻力。

土地改革中，对地主和富农均采取与过去不同的政策。对地主，由过去没收其一切财产改变为只没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的多余的房屋，其它财产不予没收；对富农，由过去征收多余的土地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除征收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的大量土地外，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和其它财产，即使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对于中农的土地及其它财产进行保护。这一政策的执行，有利于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实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集中打击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为人民十分痛恨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对于罪恶尚不十分严重，而又愿意改悔的实行宽大处理。这一政策的执行，有利于分化敌人，有利于社会的安定，给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将私人工商业户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五种类型。对违法户的处理实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对民族资

产阶级，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于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给予支持，有困难的给予合理调整，使他们有利可图。这些政策的贯彻，对于恢复生产、活跃城乡物资交流、解决社会就业等问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正由于实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虽然是在当时翻天覆地的许多政治运动中进行的，但还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拥护，非但没有引起工农业生产的破坏，而且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初步发展。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

没收官僚资本，使其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官僚资本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没收官僚资本，是属于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必然结果；但是，官僚资本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虽然是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但它却最集中，而且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当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把它没收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时，就使得工人阶级掌握起国家的经济命脉。正如周恩来所说：“没收官僚资本，把官僚资本所有制的经济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这样，就在经济方面来说，已经超出民主革命的范围”^①，而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由于没收了官僚资本，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

①《伟大的十年》，《人民日报》1959年10月6日。

空前壮大起来。据统计，1949年，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41.3%。国营经济已经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棉纱产量的49%。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和大部分的现代交通运输事业，这就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打击投机资本。新中国成立前后，市场上投机活动十分猖獗，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先后掀起了4次物价大涨风，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国政府通过采取依靠国营贸易部门控制主要商品即粮食和棉纱，集中抛售打击投机资本。1949年8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财经会议，陈云提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主要手段。掌握了粮食就稳定了城市，掌握了纱布就稳定了农村。通过在市场上与投机资本的较量和斗争，使投机资本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对此，毛泽东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打击投机资本稳定市场之举，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

统一财经，对财政经济实行由中央统一管理

新中国成立以前，各解放区因受敌人的分割和封锁，财政工作只能分散管理。新中国成立后，情况不同了，全国财政工作需要中央统一管理。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为了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必须加强经济上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集中领导的方针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因为当时我国财政经济存在严重困难，军政开支很大，财政收入有限。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胜利进军，国民党反动政府遗留下来几百万军政人员，连同我们的军政公教人员，国家需要供给脱产

人员达 900 万人。而被破坏了的工矿交通事业急待投资恢复，灾区必须救济，加上通货膨胀，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所有这些，客观上要求我们把有限的分散的财力和物力集中起来用于最紧急的方面。我们的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0 年 2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财政经济会议作出了统一财经的重要决议。其主要内容是：1. 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收入中的主要部分统归国库，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2. 统一全国物资调度，规定国家所有的重要物资，如粮食、纱布、工业器材等集中由中央管理使用，以调节供求和控制市场价格，使国营经济有雄厚的物资力量。3. 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将所有属于政府但又分散在各企业、机关和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以避免社会上通货过多的现象，增加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这三个统一克服了财力物力的分散和浪费，对于扭转财经困难局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投机资本家利用国家的暂时困难，凭借他们持有的经济力量，捣乱金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疯狂地追逐暴利，多次挑起物价飞涨的风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给我们各项工作带来巨大困难。为了打击投机资本的猖狂进攻，我们的党除运用政权的威力，加强了金融管理，逮捕投机资本家以外，国家还加强了对主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纱布等的收购和调运工作，然后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依靠手中掌握的强大物资力量，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地大量地抛售物资，使投机资本受到毁灭性打击。稳定物价以后，在私人工商业方面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普遍发生了经营困难的问题，不少

厂家停产倒闭。国家不能眼看着他们垮下去，因为这对国民经济的恢复是不利的，所以决定采取调整工商业的措施。调整工商业主要抓了三个环节：调整公私关系；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通过这些措施，1950年下半年，经济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调整工商业，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也使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

继续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

旧中国的农民之所以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存在着封建的剥削关系，存在着封建的土地制度。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的广大农民却只占有约20%~30%的土地。因此，无地少地的农民为了不致饿死，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并忍受其剥削。所以，这种封建的土地制度是近代中国被侵略、被压迫、贫困落后的根源。不改变这种土地制度，农村生产力就无从发展，广大农民群众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而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实行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①。

进行土地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是从1927年革命根据地建立起就开始了的。但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土地改革的政策在具体做法上是有些不同的。1948年4月，毛泽

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明确规定了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①在这条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各解放区在 1947 年以后，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 1949 年全国解放前夕，已在 1.45 亿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民主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土地改革任务，还必须继续进行，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1950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并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指出，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从 1950 年开始，到 1952 年底，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尚待解放的地区外，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使 3 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 7 亿亩土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 700 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使几千年处在封建制度剥削压迫下的农民群众翻了身，他们由土地的奴隶真正地变成了土地的主人，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从 1950 年到 1952 年，农业总产值每年分别比上年增长 17.8%、9.4% 和 15.2%，这就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17 页。

开展增产节约与“三反”、“五反”

为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在增产运动中揭发出干部中的“三害”，即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于是同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并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开始了“三反”运动。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进行，揭发出党政军民内部的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大多是和社会上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的。为了彻底铲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五毒”，即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进行斗争。1952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从1951年12月到1952年5月，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丑恶面目，沉重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纯洁了国家机关内部，增强了广大人民抗腐蚀的免疫力。这场运动不仅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而且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后来和平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铺平了道路。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恢复和发展经济

正当中国人民为国家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奋斗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战争期间，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工人提出了“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

是枪炮”的口号，农民提出了“多产棉花多打粮，打败美国野心狼”的口号。各阶层人民中间还普遍开展订立爱国条约，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这就不仅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战争环境下能够恢复和发展经济，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个奇迹。

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并有一定的发展。一改原来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片衰败局面，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到 1952 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除个别项目外，都已恢复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农业总产值达 439.8 亿元，比 1949 年增加 48.5%，年平均递增率为 14.1%。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稳住了中国经济的大头，不但为农业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发展工业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

工业生产获得了比农业更快的恢复和发展。1952 年工业总产值为 343.3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144%，年平均递增 34.8%；其中现代工业达 220.5 亿元，增长幅度更大，年递增 40.7%。这样，在整个工农业生产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由 30% 上升为 41.5%，现代工业的比重由 17% 上升为 26.6%。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首先是物价稳定，人民基本生活得到了可靠保证。旧中国人民最感痛苦的就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物价飞涨。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到 1952 年基本控制了物价后，3 年时间一直保持了物价稳定，从而使广大人民从物价飞涨的恐慌中解放了出来，基本生活得到了可靠保证，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了。二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由于农民摆脱了封建剥削，无偿得到了土地和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 700 亿斤地租，平均每人每年等于多收入 200~300 斤粮食，对于原来糠菜半年粮的农民来说，这二三百斤粮食当然就是很大的改善了。据统计，1952 年与 1949 年相比，各地农民收入一般都增加 30%，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增加 20%。三是工人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工资收入不断提高。全国解放时，城市失业人数达 400 万人，相当于 1949 年底在职人数的一半。1952 年已有一半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其他人员也得到了一定安置。这一年，全国职工总数达 1580.4 万人，比 1949 年增加了一倍。1952 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工资改革，初步建立了工人和职员的工资等级制度。1952 年与 1949 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 70%，并开始实行了劳动保险、工费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储蓄，1952 年比 1950 年增加 5.5 倍。

从 1949 年到 1952 年，3 年的时间是短促的，但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尽管当时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还很低，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新中国方面，是有能力把 20 世纪中国引向富起来的道路上来的，从而为以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扫清了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向社会主义过渡

经过 3 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是，恢复时期结束后的中国国民经济仍然还十分落后和薄弱。从工业方面来说，1952 年的水平，不仅落后于苏联 1928 年的水平，而且落后于东欧各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按人口平均的工业产值，比苏联和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要低得多，特别是还有许多工业部门没有建立起来。从农业来说，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的生活确有提高，但他们中间 60%~70% 的人生活仍有困难。农村个体经济很不稳定。从经济结构来看，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还只占 43.1%，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产值只占 35.5%。在农业经济中，小农经济仍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些情况表明，只有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富起来。

为了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2 年 9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谈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设想。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再次谈到这个设想。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加强这方面问题的探讨，并且愈来愈明确和趋向一致。1953 年 2 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更加确切地说：我给他们（指湖北孝感地委）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比如过桥，走一步算过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年到十五

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毛泽东这一新构想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孕育并成熟。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离开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8月，毛泽东在审阅一次会议结论的批示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其改变的主要之点是确定了过渡时期的起止时限，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一次会议又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条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记载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

毛泽东提出的这条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它一方面规定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同时也规定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而这两方面的任务又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体现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变革社会所有制的辩证统一。因此，这条总路线实际上是一条使中国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总路线。1953年12月，毛泽东在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时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

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①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一切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他又认为，只有把中国由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富强的工业国，才能使中国真正地富起来。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②因此，在 1951 年 2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3 月，毛泽东在刘少奇送他审阅的向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所作的报告稿上写道：“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上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依照毛泽东的布置，刘少奇多次讲到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问题。5 月，在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在三年准备（还有 16 个月）之后，我们来一个十年经济计划，到 10 年后，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变，那时我们不但有强大的农业，而且有我们自己强大的工业，使中国变成一个富足的国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1 年底，我们国家提出了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一计划的重点是用一切办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952 年 12 月党中央在《关于编制 1953 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中指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05 页，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80 页。